

13-001

长
96
47

福建事变期间

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

专 辑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福州市分会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福建省政协主席、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伍洪祥同志（右一）在听取讨论会筹备情况的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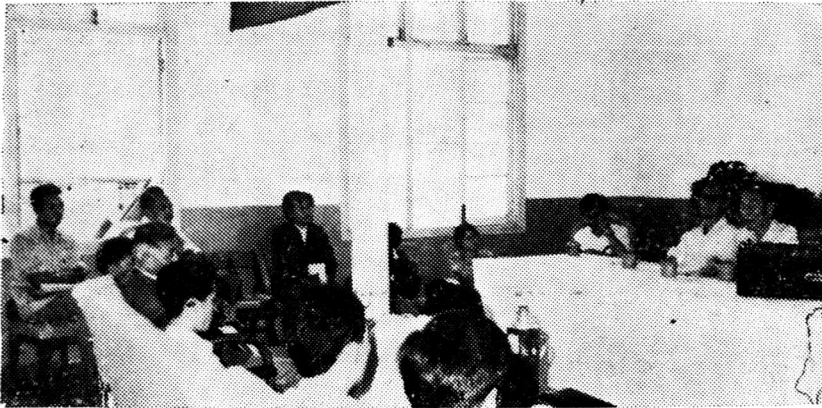
讨论会代表参观福建事变旧址鼓山时，在涌泉寺前合影。



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苏里同志致开幕词。



福州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孙明同志在讨论会结束时讲话。



第一小组讨论情况



第二小组讨论情况



第三小组讨论情况

亲身经历福建事变的四位老同志在会上发言



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朱伯康同志。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所长、教授陈碧笙同志。



地质部水文局顾问、
北京《老战士诗文集》总
编辑杨采衡同志。



福州华侨塑料厂郑
乃之同志。



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会场



在讨论会的主席台上

自左至右：陈云飞、杨采衡、伍洪祥、杨德明、苏里同志。

前 言

今年十月廿七日到三十一日，我们在福建事变策源地——福州，举行了“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应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江西和本省有关单位同志共六十八人。其中有亲自经历福建事变的杨采衡、陈碧笙、朱伯康、郑乃之等老同志；有来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医学院、福建省委党校、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州市委党校、福州师专和省直有关部门、福州军区政治部、省军区政治部以及我省各地市的党史、现代史的研究人员和党史工作者。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省党史研究会都派代表出席指导。讨论会共收到论文和发言材料等二十七篇，资料两本，共约三十八万字。会议以党的十二大精神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思想，以福建事变期间我党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和影响为中心，采取专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的形式，围绕党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方针；党内在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分歧，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等问题，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有十四位同志作了专题发言。会议还组织与会同志参观了鼓山、于山等福建事变的活动旧址。

会议期间，省政协主席、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伍洪祥同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委员杨德明、陈云飞同志等接见了到会代表。福州市委副书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苏里同志、福州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孙明同志等出席并讲了话。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福建事变期间我党对十九路军工作和影响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现将这次讨论会的发言材料（送交讨论会的资料除外）印成专辑。因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福建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福州市分会

目 录

“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

- 开幕时的讲话……………苏 里 (1)
- 福建事变的前因后果……………朱伯康 (4)
- 闽变的回忆……………陈碧笙 (10)
- 我党在福建事变期间与十九路军合作问题的探讨
……………梁家淦、符王玲、薛宗耀、方长明 (18)
- 试论党在福建事变上的策略……………王顺生 (42)
- 福建事变与统一战线……………薛谋成 (59)
- 在福建事变中“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叶心瑜 (72)
- 福建事变初探……………郑勉己 陈能南 (85)
- 福建事变与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策略……………佟 静 (104)
- 回忆我党在十九路军内的活动情况……………郑乃之 (123)
- 闽变时期的十九路军反蒋军事斗争……………杨大伟 (134)
- 关于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问题……………高炳康 (152)
- 我党与入闽后十九路军关系上的经验教训……………盖 军 (164)
- 驳李德《中国纪事》中的一则谎言……………林蕴辉 (172)
- 回忆闽变二三事……………杨采衡 (177)
-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又一次尝试
……………方庆秋 (180)
- 王明“左”倾关门主义与福建事变……………林平、郑远镇 (194)
- 对福建“人民政府”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的初探
……………欧阳佑民、刘遂生 (206)
- 中共泉州特支争取十九路军驻泉部队的经过……………何天松 (214)
- “闽变”与闽东革命武装暴动……………陈松青 (218)
- 试论福建人民政府……………沈家五 (222)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的前后及其失败的原因

.....	梁 岱	(232)
福建事变期间十九路军与红军的几次谈判.....	王顺生	(239)
龙汀省人民政府兴亡概述.....	苏 舒	(248)
十九路军在漳纪略.....	熊寒江	(263)
“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 闭幕时的讲话.....	孙 明	(267)
参加“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名单		(271)

(目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书面发言列后)

苏里同志在“福建事变期间我党 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同志们：

正当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的时候，“福建事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讨论会”今天开始了。我代表中共福州市委、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自从我们根据中央和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关于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意见，决定举行这次讨论会，发出邀请信以来，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单位、有关同志的热切关注和支持。今天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江西和我省以及各地市的同志六十八人。其中有经历过“闽变”的老同志杨采衡、陈碧笙、朱伯康、郑乃之等；有全国政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医学院、福建省委党校、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学者和党史工作者。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省党史研究会、福州军区政治部、省军区政治部都派代表莅临指导。省各有关部门和各兄弟地市也派代表参加这次讨论会。许多同志在百忙中撰写了很有价值、很有见解的论文。这里，我谨代表讨论会的筹备小组向莅会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明年是福建事变发生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我国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蒋介石实行卖国内战政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历史关头，在我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日益高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楷等十九路军将领，接受我党抗日三条件的号召，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Am. / 1988 / 01

在福建福州发动事变，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南京反动政府实行决裂。并实行联共政策，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开展了反蒋抗日斗争。福建人民政府虽然只存在五十多天，就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但它仍然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聚集在“闽变”的策源地——福州，共同研究这次事变，回顾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十分有益的。首先，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闽变”前，我党对十九路军作了许多工作，有过不少影响，十九路军是响应我党的共同抗日宣言，走上联共道路的；事变期间，我党和十九路军进行了谈判，签订了协定，互派了代表，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也有过许多的交往。可是，由于这一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正处于高峰，致使我党在对待福建事变的策略方针上犯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这种关系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因而，认真收集、整理、研究“闽变”时期我党与十九路军和人民政府之间关系的史料；真实反映、正确阐述“闽变”事件中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的历史面貌；弄清事变前后我党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和影响；探讨党在这一事件中的历史教训，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一方面能为编写党史正本提供可靠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能通过总结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工作。这也正是我们举行这次讨论会的宗旨和主要目的。同时，“闽变”在中国现代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闽变”发生的历史背景、事变的经过及其失败的原因，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作出客观的评价，也是很有意义的。再从我们福州地区来说，要写好这一时期的地方史，同全国党史界、史学界共同研究福建事变，更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为了开展“闽变”期间我党与十九路军关系问题的学术讨论和资料的收集工作，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组织了市委党校等有关单位和同志，访问了熟悉“闽变”情况的老同志黄火青、吴振英、傅柏翠、罗明等，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并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由

于我们的力量不足，水平有限，工作又刚开始，基础比较薄弱，在“闽变”问题的探讨中，虽然作了一定的努力，但今天能向大家提供的资料还很有限，而且很不完整，只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们建议，这次讨论会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探讨：1. 党中央对福建事变的方针，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和影响；2. 事变前后双方有哪些联系、谈判、协定、合作；3. 党内在对待福建事变问题上的分歧；4. 福建地下党在福建事变期间的任务、活动和作用；5. 双方关系未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主要原因；6. 福建事变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关系；7. 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此外，对福建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经过、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福建事变失败的经过和原因，以及对“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评价等问题，也进行一般性的讨论。

我们热切希望，到会的同志以党的十二大精神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思想，以福建事变前后我党对十九路军的工作和影响为中心，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开展讨论，敞开思想，各抒己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正确、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意义以及它的经验教训。大家都知道，史料是研究和讨论的基础，我们更希望在学术讨论的同时，多多提供有关我党对十九路军工作和影响的史料，或提供搜集有关这一方面史料的线索。因为学术讨论必须百家争鸣，而在党史资料的征集上，则要实事求是，把史料立准，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丝不苟，真实可靠。我们希望能在这讨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搞好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使我们这次会议不仅是一次福建事变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而且又是一次资料的征集会议，为编写党史正本作出贡献。我们还希望同志们对如何开好这次讨论会多多提出意见，以便把这个问题讨论得更好，更深入。

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向热情关心和支持这次讨论会的中央、省委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向各大专院校、党史研究部门和兄弟单位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预祝这次讨论会圆满成功！

福建事变的前因后果

复旦大学经济系 朱伯康

1. 民族危机、矛盾激化，促成福建事变的发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一再退让。而日本侵略者则得寸进尺，占领我东北全境后，又不断向榆关、天津、塘沽、青岛、厦门、福州、汕头、上海等地挑衅。不久内蒙、热河、陷入沦亡边缘，华北又特殊化，树立傀儡政权，不许驻扎中国自己的军队。日本军人在中国耀武扬威，一意欲实现“田中奏摺”中所定先吞满蒙、次侵华北、再灭全中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国策。蒋介石仍坚持不抵抗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意“剿共”。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抗日救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声，遍及全国。国民党内部这时亦发生变化，原先处在独立状态的广东政权孙科，古应芬等与蒋介石言和，“共图国难”。粤方要求调十九路军到京沪一带驻防，以便保障孙科、古应芬等到京参加蒋政府有安全保障，作为先决条件。在“宁粤合作”的要求和策动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路军被调至南京—上海一线，陈铭枢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戴戟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十九路军到上海后，遇到日本侵略者不断挑衅。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二日上午，日本侵华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引翔港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杀伤维持治安的华捕。同日下午，又在北四川路捣毁中国人开设的商店。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于翌日（二十一日）上午借口日本僧人五名被殴伤，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二十二日，日本驻沪第一舰队司令部声称：“如果答复不满意，将采取严厉的对付行动。二十七日晚八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竟向上海国民党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对解散抗日救国会等无理要求，作出答复，至迟到

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为止，否则日军海军将采取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月二十日以来急骤地连续挑衅，表示日本侵略军真的要行动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却完全屈服，市长吴铁城命令市公安局及社会局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至下午五时查封完毕，正式答复日本总领事馆。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表示满意。但到当晚十一时，日本第一遣外司令官盐泽本一，却发出另一通牒，强迫要求我上海驻军让出防地，交由日本军接防占领。且不待答复，当夜十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和便衣队，向闸北十九路军防地七十八师翁照垣旅张君嵩团进攻。十九路军被迫抵抗。第二天，蒋介石政府下令十九路军退让，战事已开，前线官兵拒不执行，于是“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就爆发。

淞沪抗战，激烈战斗持续了一个月又三天，日方不断增兵，五易主帅，兵力增至五个师团，计七、八万人，军舰八十余艘，飞机百余架，大炮三百余门。我方未增兵，仅在战事爆发初张治中的第五军两个师要求参加抗战外，其余请求支援抗日的军队，如上官云相师已开至京沪线，要求参战，蒋介石一概不准。十九路军当时只有二万五千人，加上第五军两个师，总人数不满四万，装备比日军差，无海军空军支应，力量悬殊，但官兵仍坚持抗战。蒋介石政府却仍坚持“和平”解决，避免再战，请英、美驻华公使斡旋调停。至三月一日，强令休战三天。蒋政府外交部终于和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令我军撤出防线，交由警察接防。

“一·二八”抗战，使十九路军深得众望，蒋介石不满，若久驻京沪，更感不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突然下“调虎离山”、“借刀杀人”之计，命令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此举使蒋方可收“一箭双雕”之利，既可以让出京沪地盘，又可使中共红军和十九路军互相残杀，削弱双方力量。十九路军到达福建后，官兵均愤愤不平，十分苦闷。当时福建地荒民穷，十分凋敝，小军阀割据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土匪横行乡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切税捐，解交南京，十九路军军费支出，被扣甚紧，蒋光鼐虽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但有职无权。而且蒋介石对十九路军驻闽又不放心，故意扶植刘和鼎、卢兴邦等势力，以为牵制。又以“调训”为名，调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到南京中央军校受军事训练，暗中有兰衣社进行活动，回去

时授以密码电本，令作暗探。驻漳州十九路军总部曾发现此事，人证具在，曾严肃地处分了几个，这增加十九路军和南京的矛盾。这时（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东北义勇军奋起抗日战斗在白山黑水间，北方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李济深在南方联络两广和福建组织抗日部队。蔡廷锴奋起响应，挑选优秀军官和久经战斗老兵，组成援热义勇军北上先遣队共两个纵队，分别由张炎、谭启秀率领，蔡亲自指挥，由龙岩和漳州出发，进入粤境会师，迂迴至老隆出源潭，乘火车抵湖南耒阳，沿途受到蒋政府阻挠，不能顺利前进，终于因何应钦与日方签订《塘沽协定》而被迫退回，官兵均甚气愤。尤其矛盾最大的，是蒋介石命令执行“剿共”任务，若服从命令与红军作战，一则官兵不愿，二则无胜利可能，只能遭受损失，削弱自己。若不执行命令，则有“违抗军令”，受到惩罚危险。

在人事方面，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后，陈铭枢的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职务被取消。接着不久，陈铭枢的交通部长职位亦被撤换，出国考察。回国后居住香港，常与李济深、李宗仁、黄绍雄、黄琪翔、章伯钧等来往，谈论国事，均对蒋介石不满，认为要抗日救国，只有反蒋，接着陈铭枢自香港秘密到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及少数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会晤，交换意见，蒋、蔡等对蒋介石紧扣军饷、不给优良武器及装备，受到歧视，深表不满，加以各种亲身感受磨擦不满之事，更有反感，亦有反蒋之意。蒋、蔡表示：真公（陈）如有决定，愿意服从领导。此后陈铭枢、李济深及蒋蔡即积极筹备反蒋工作。以上各种事实说明，民族危机、矛盾激化，是“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也可以说，时势推移，矛盾激荡，促成“闽变”爆发，其趋势，近似“逼上梁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合作关系未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影响全局。

在福建事变酝酿过程中，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均渴望能和中国共产党接近，能达成抗日反蒋同盟，曾有将近一年时间主动多方设法，寻找关系，和中共接触，最早陈铭枢自香港派梅龚彬到上海，找党的关系。梅由香港到上海不止一次，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未得要领，亦无结果。也曾由朱蕴山、刘叔模找关系，亦无成果。一九三三年八月间，蒋光鼐、蔡廷锴决定另辟途径，试从福建前线 and 红军接触，

派参议陈公培前赴苏区，在离闽侯二百余里以外的延平西面王台，见到驻在福建的最高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将军，受到很好待遇，带回彭的回信，请蒋、蔡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和党中央谈判。陈公培回来后，见到可谈话的熟人，即手舞足蹈，兴高采烈，说有希望，有希望，对他很好，可以随便走动，无人跟踪，能谈得拢，前途乐观。同年九月间，蔡廷锴征得蒋光鼐同意，派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为正式代表，到江西瑞金党中央所在地，陈公培亦同行，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切接见，表示欢迎，极力赞成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谁知当时文字草案准备工作完成后，双方代表签字，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博古迟疑不决，不肯签字。代表党中央的负责人不肯签字，也就不能成为正式文件，对双方都无约束力，徐名鸿回来说，王明、博古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性质的革命力量，有欺骗性，会和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争民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绝不可合作。徐在苏区期间，始终未曾见到王明，博古。

全面的抗日反蒋联盟虽然没有正式达成，同年十月间，却达成一项局部的边界协定，由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陈小航（解放后为文学翻译家，名罗稷南，居上海）与中央代表张云逸在闽西龙岩签定。从此边界十分安宁，十九路军保护商人运销物资进入苏区。此后，十九路军又派参谋处长尹时中为代表驻在瑞金，中共派代表张云逸驻在福州及十九路军总部。双方进行正式联系。同年十一月下旬，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及对蒋军作战初期，还不时得到苏区来电，告知蒋军先头部队达到某地向某处前进。但是可惜，福建红军中途西调，向江西中央苏区集中，没有靠近十九路军，反而远远离开，不作十九路军的掩护者，使十九路军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一翼，失去了屏障和依托，孤立无援，孤军作战，很快只有两个月就失败了。虽然失败的主因在十九路军方面，但合作没有发展和巩固，却影响到全局。

最近阅读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得知彭总当时主张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支援十九路军，书中有一段说：“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一、三军团和七、九两军团，向浙赣两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进抗

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见原书第184页）。如果当年彭总的建议被采用，他的计划能实现，不但十九路军不会失败，七万支枪及一切军事装备不致白白地交给蒋军，十九路军可以成为红军的一部分，而且红军可乘势壮大，扩大革命根据地，且可避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或可避免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可以早一些时间取得全国性胜利。

由此可见，双方合作关系未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影响到十九路军的加速失败和红军的损失，王明、博古的过左路线对双方都有害。因此可以说，党的统一战线，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关系全局，关系历史发展进程，是“一件天大的事。”有之，创造胜利；无之，则受损失，或招致失败。

3. 十九路军自身的缺点和政略战略的错误，招致失败。

十九路军原是粤军（国民革命军）四军的一部分，在北伐战争中有过战功，虽平时注重训练，有丰富战斗经验，能走善战，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部队较精锐，但毕竟是国民党中旧式军队，在江西和红军作过战，受蒋介石利用。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先，未曾根本改造，只凭官兵爱国热情，在军中散发《邓择生集》（邓演达著作），宣传国民党左派思想，在江西与红军接触和在上海与日军作战时思想上有进步而外，尚未改造成为新军队，乡土观念、宗派观念、旧军队习惯仍很重，所以后来在对蒋军残酷战役中，经不起考验，被裙带关系和重金收买所软化，被强大军力所压服。

在政治方面，第三党和陈铭枢为中心的生产人民党，力量都很薄弱，小资产阶级的中间路线，改良调和的社会民主思想，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在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间路线根本走不通。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逐步改造自己，走彻底革命道路才能走通。但在当时（一九三三年）党的王明路线尚在统治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尚未发展，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及其中提到的各项具体政策尚未提出，十九路军单独行动，自然要失败。

在政治联络方面，李济深、陈铭枢及福建十九路军所联系的各派各系，约定共同反蒋抗日，都不巩固。首先联系成功的是第三党，黄琪翔、章伯钧代表第三党表示愿意参加，实现邓择生遗志，不断输送